

1601

鄭州文史資料

一九九三年第一輯(總第十三輯)



荟萃“三亲”史料
博览近代郑州

鄭州文史資料

第十三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

封面题字:海丙离

封面设计:秦增美

郑州文史资料
1993年第1辑
(总第十三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郑州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

郑州市北二七路76号 邮政编码450000

郑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3年6月

河南内部报刊号:HN93—2197 工本费1.40元

目 录

- 我在郑州一中任教的经历 王隐邨 (1)
- 我在《群力报》的始末 戴子腾 (85)
- 我所知道的孙桐萱将军 田瑞珍 (101)
- 冯玉祥将军在郑轶事 高一轻 (111)
- 郑县抗日演讲团 谷 风 (115)
- 演剧二十二队在郑州 申抒真 (117)
- 民国时期郑州的银行机构 … 杨达口述 杨慧兰整理 (120)
- 民国时期河南省发行的纸币
..... 杨达口述 杨慧兰整理 (132)
- 河南省首家农村信用社 …… 杨达口述 杨慧兰整理 (136)
- 旧时梨园俗规 谷 风 (140)
- 青洪帮在郑州的发展 李茹玲 (144)

补白

- 刘峙与“太太鱼” 高一轻 (110)

质疑·订正·补充

- “魏巍和郑州报纸副刊”的一点订正..... 崔景元 (114)
- 《郑州日报》的补正..... 王华农 (135)
- “走私黄金案”的一点订正..... 王永川 (139)
- “三报人保释一青年”的补正..... 李 泥 (155)

我在郑州一中任教的经历

王隐邨

郑高的崛起 ——郑州一中的前身

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前夕，国民党胁迫着大批学生仓惶南逃，少数不愿走的高中学生便流落在郑州。解放后，我在郑州市文教局工作，接中共郑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指示，把留在郑州的高中学生集中起来，由市人民政府创办起来我市第一所高级中学。1949年元月开始筹备，把郑县中学、国立十中、私立郑州明新中学、林县中学和武陟中学等留郑的高中学生200余人集中起来，在书院街原明新中学的校址上，创办了郑州市高级中学。校长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长漆鲁鱼兼任，副校长张静岚，教导主任张耳（是学校唯一的中共党员）。3月5日正式开课。这就是郑州一中的前身。

解放前郑州的教育非常落后，学校寥寥无几，明新中学算是一所较好的学校了，但校舍面积不足10亩，设备简陋，在我们接收时，全部理化仪器还装不满一筐。没有电灯，晚上教师备课、学生自习大半都使用空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，几十个住校学生睡的是土炕。一个小小的操场，连一付篮球架也没有。5月，学校开课已两个月，教导主任张耳因故调市委

宣传部待命，我被调来任副教导主任。建校初期学校工作困难重重。

学校从表面看，很像一座饱经沧桑的深宅大院，前后两进，中间是两层楼房的过厅。前院是办公用房，后院是教工宿舍，再后面是教室和学生寝室。过厅西南角屋檐下，有一间面积约8平方米的小屋。由于校舍狭小，教师都是几个人挤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唯独这间小屋空着，我来校后便成了我的栖身之地。

小屋座西向东，北墙有门通往过厅，正对着楼梯。门扇是钉在门框上的一张苇席。屋门朝东，旁有窗户。屋内铺一张床、放一张桌子、一把木椅，也尚可容膝。听说郑州沦陷时，日寇曾在这个院子里设过司令部。日本投降时，有一个士兵吊死在这小屋的门框上。这可能就是小屋空无人住的原因吧！日寇的狰狞面孔，在沦陷区我是看惯了的，只觉得可憎可恨，并不可怕。活的鬼子我都不怕，难道还怕什么死的鬼子吗？于是，我便在这个小屋里渡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

学生宿舍，有一排土炕一排木床，窗户少而小，通风不畅。夏夜闷热已令人窒息，何况空中有蚊子嗡嗡叫，床上有臭虫肆虐，同学们风趣地说这是：“上有飞机，下有坦克，腹背受敌，内外交困”。每晚学生们围着小煤油灯，刻苦学习，因没灯罩，油烟很大，把鼻孔熏得乌黑。下自习回寝室睡觉，还得投入一场战斗。每当我去查寝室，一进入后院，便可听到“杀伐”之声，杂以胜利的欢笑，我便知道“围剿”的战幕已经拉开了，心里一阵酸楚。能责怪学生不按时就寝吗！？有时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战斗，消灭几架飞机（蚊子），分享一点胜利的欣慰。

当时学校还无力安装电灯，师生们便把仅有的零用钱拿出来，买电杆、架电线，从南大街把电引入校院。从此，告别了空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。

生活虽很苦，心情却是开朗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本帐，这就是新旧社会的对比。在党的阳光普照下，美好的前景足以抵消目前生活之苦而有余。不是么？

积极投入教学改革

建校初期，校内教师人数不多，确又分成几派，互相倾轧。加上思想上的雇佣观点、自由主义、文人相轻和教学上的注入式、满堂灌、教书不育人；再加上当时解放之始还没有编出适合的教本，使这种自由主义教学泛滥。例如有一个教师在休息室内公然说：“听到打钟，上堂念经”。这与一个人民教师的思想水平相差太远了。教学改革势在必行。

1949年秋，省市委加强了对学校的领导，改名为“河南省郑州高级中学”。为了把郑高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，1950年我们提出了进行“教育革命”的口号，目的是要革掉教师思想上的雇佣观点、自由主义、文人相轻和教学上的注入式、满堂灌、教书不育人等旧的思想观念。

1951年3月，教育部指示：“学校必须强调教学，行政工作作为教学服务。”这样，我们的思想更明确了，进行教改的决心更增强了。当时进行教改，我们首先抓了两条根本措施，一是加强政治学习，提高教师思想觉悟，克服雇佣观点，树立服务观点；二是加强业务学习，提高对新教法的认识。政治

学习规定每周4次，业务学习2次，都在早晨6—7时进行。学习中有了问题，大家就在一起深入讨论，为了研讨方便，把教师按业务相同或相近的关系编成研讨小组，这就是教研组的雏形。每周讨论2次，都在晚7—9时进行。行政人员另编小组学习。政治学习内容很丰富，业务学习内容很贫乏。这时省教育厅副厅长曲乃生的《东北教育参观初步总结报告》印发到校，我如获至宝。为了先学一步，然后领导大家学习，我便不分昼夜挤时间苦苦钻研。接着又学习了苏联卡尔波娃的《课堂教学的分析》和苏联的教育理论，经过钻研，有了一定程度的心得，再和大家一同探讨，这样我就取得了领导教学的主动权。

经过半年的努力，统一了教师们的认识，首先在国文一科试行了“自学辅导教学法”的实验。它的特点是：一、以学生自学为主，教师站在辅导地位；二、利用小组讨论，以养成学生集体自学的习惯；三、注意培养学生读、写、说的能力。这无疑对“注入式”、“满堂灌”、“满天飞”等旧教学法是一个革命。实验取得了一些效果，提高了师生对教改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，认为必须加强集体研究，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，因此，我校便成立了各科教学研究小组。1952年，我们又读到了苏联凯洛夫《教育学》，大家如饥似渴苦学，日夜埋头在教法改革的探索中。语文教研组在教学实践中已带好了一个头，我使用典型引路的方法，使大家都积极地行动起来。光凭教师的热情和主观想象是不够的，必须采用《课堂教学分析》的方法来加强教学的科学性。当时我们就把它叫做“新法教学”的实验。所谓“新法教学”即在教学的过程中，根据每个阶段完成具体任务的不同，把它分成若干类

型，例如综合课、复习课、新课等。不同类型的课又有不同的结构，例如讲新课时，要经过复习旧课、导引新课、讲解新课、检查巩固、布置作业等五个环节才算完成，所以也叫做“五步教学法”。课堂45分钟的分配是：检查学生课前准备情况约占1分钟，可使学生集中注意力；复习旧课、导入新课约占5分钟；讲解新课占30分钟；复习新课的重点、难点加以巩固，约占5分钟。五个环节可根据讲课的类型不同灵活运用。这种教法，在于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，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，当堂解决问题，减轻学生负担。这时政务院颁发了《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》的指示，要求学生每周自习时间以18个小时为标准，而我校学生每周自习时间竟达30多小时，因此，新法教学势在必行。学校建立了新法教学推行组，并对校领导提出面向教研组，面向班级的要求；对学生提出了勤学、苦思、多练的要求。市文教局也成立了新法教学研究小组，对我校的实验予以支持和协助。

1951年10月，我们先从一个班开始试行新法教学，1952年春推广到了3个班，秋季推广到7个班，同时在两个班试行“计划自习”予以配合。1952年夏，我参加了“三反思想改造”学习，两个月后学习结束，我和王洪延老师披红戴花在锣鼓声中回到学校。领导我们学习的于景超同志，以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名义来校主持工作，学校师生的思想面貌开始发生变化。在广大师生积极努力下，在学校支部和上级党政领导的关怀支持下，郑高的新法教学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，教法改革取得了重点突破：

一、在教师中间形成了政治上的团结，增强了纪律性，发挥了集体智慧，出现了争挑重担讲实效的政治态度，克服了

过去的各种不良习气。在数学教研组，一天晚上有人向李鸿谋老师提出一个有关不等式的问题，研究未得结论。李老师夜不成眠，苦思冥想，天刚亮他便从床上跳下来，大声嚷着说：“那个问题我想起来了！”于是同屋老师的欢笑声震动四邻。李老师兴奋地说：“一个人的问题，就是共同事业中的问题；一个人的经验，也是大家的财富”。这是成立教研组后发挥集体智慧所产生的喜悦和感慨。

二、加强了教学的计划性，开始进行先一周备课，写好课时计划，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，那种“听见打钟，上堂念经”的论调消失了，并成为后来自我批判的资料。

三、初步坚持了课堂教学制度，遵循教学原则，由浅入深，循序渐进，分层打夯，逐步巩固，较好地当堂解决问题，保证了三留（留作业、留时间、留方法），解决了学习上的超时间问题，减轻了学生负担，活跃了学生课外活动，保证了学生的全面发展。

四、制订和充实了教研组的工作职责、课堂教学、计划自习等必要的规章制度。执行中认真检查，做到了无计划不许上课。我们有一位白崇浩老师，他是清华大学毕业，教地理课，业务相当熟悉，工作认真负责。但有一次因故他没有事先写好课时计划，上课前便找我说明情况，自请暂不上课。我按规定批准了他。虽然后来他利用自习时间把缺课补上了，但这件事在教师中震动很大。

我们大胆尝试这种新法教学，深得市教育局王子珍局长的支持。他时常到学校了解情况，有时还参加研讨，给我们工作上以鼓励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。1953年陈德昌任校长，我任教导主任。在省教育厅主持下，让陈校长向全省播讲、介

绍了我们的“新教法”取得的成果，博得全省兄弟学校好评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。从此，我校教学不仅有法可依，有章可循，而且是有法必依，有章必循。这不仅改变了学校教学面貌，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，提高了思想认识，明确了前进方向，坚定了我们把郑州高中办成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学校的信心。后来我常说郑州一中是由教改起家的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当年投身于教改的积极分子，例如王洪延老师现任中州大学校长，翟鹏仓老师现任新乡师大物理教授，李鸿谋老师曾任郑州市教育局数学教研室主任，阎仲铭老师曾任郑州七中校长，可惜李鸿谋与贾静岚等都已与世长辞了。

我当年由于操劳过度，患了肺结核病，陈校长劝我暂时休息治疗，并请省教育厅协助联系了疗养院，让我离职半年疗养。我因“新教法”实验刚取得初步效果，正要进一步提高效率，十几位骨干教师对教改热情很高，有的废寝忘食，我实在不忍离去。陈校长是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老同志，善于联系群众，团结同志，只好改变主意，不去疗养院，但劝我及时治疗，适当休息，早日康复。我从心里感激他对我的关心，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革命友谊，在我们共事期间，关系十分融洽。

1953年夏，学校迁到文化区后，改名郑州第一高级中学。1955年7月，肃反运动开始，教工分两批参加学习，每一个教工都要在运动中彻底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。通过学习，划清了敌我界限，增进了团结，工作开展比较顺利起来。此后我被选为省市政协委员、市人大代表、民盟郑州市副主委（1952年参加民盟）、民盟省委委员、市政协常委。在社会活动方面日渐繁多，这是党对自己的培养和信任。我下决心要

努力争取加入共产党，写了第一次入党申请书，送到学校党支部。

1956年，郑州一高被定为省重点中学。1957年学校迁到南阳路，5月党开始整风运动，一高民盟支部坚决跟着党走，始终保持正确立场，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。我经过这次斗争的考验，可以说是向党组织靠近了一步。

艰苦的历程及十六字校风

正当我们埋头苦干，在教学改革方面迈出可喜的一步时，大跃进的风吹到学校。1958年3—4月份，在校党总支的领导下，进行了反浪费、反保守的“双反”运动，提出了学校中最大的浪费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红不专。因为当时大家对红专关系的理解带有片面性，所以很快就把运动引向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来。在“向红透专深大跃进进军”的号召下，教师们互相教育（即互相揭发）、自觉革命、向党交心；接着便是自画像的展览与讲解。当时教师交心共18000多条，自画像913幅。在此基础上开展了“红与专”大辩论，批判了不少教师的所谓“白专”思想。这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批判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收到思想改造的效果，但由于过火的批判，也挫伤了一部分教师的积极性。例如教历史的刘老师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对历史教学有一定贡献，这时就像惊弓之鸟，连备课都要把课本放在抽屉内，把抽屉拉开一半，露出课本，偷偷地看。

1958年9月郑州一高改名为河南省郑州市第一中学。学

校招收了一个“跃进班”，学生两年毕业，开展了学校大跃进的试点。同时，学校也开展了教育大革命运动。在前几年新教法实验时，我自信还能走在前头，领导大家阔步前进，可这时我却像个小脚女人一样。1958年5月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方针。校党总支便号召全校师生树立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敢想、敢说、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，积极投入勤工俭学活动。当时学校把搞基建、挖土方、下工厂、开河渠等重体力劳动做为主课，让学生停课劳动，以干代学。并提出向半工半读过渡和学校经费自给自足等“左”的口号。学生在省工人文化宫前挖土方时，把黑板放在壕沟边沿，在换班休息时，教师给学生讲课。说这就是争分夺秒，就是大跃进！

还值得特别一提的就是大炼钢铁。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大办钢铁运动之后，学校也迫于形势只得派出教师外出“取经”，由张滋培等几位物理老师负责。取经回校后顾不得休息，在全校教师协助下，一晚上垒起来十几座炼钢炉，把学校操场塞得满满的。校院里煤和食盐堆积如山，炼钢用的原料供给不上，便动员师生捐献，没有废铁可献的师生，不得已便把自己烧饭铁锅、铁炉子搬来，砸成碎块，放在炉里烧炼，日夜不停。每天黑夜，操场上火光照天，人声鼎沸，煞是壮观。上级领导也派人到校监督，随时上报完成的数字。我们把碎铁放在炉里烧呀！烧呀，烧成铁水流了出来，与炉渣混在一起，凉后变成硬块，说这就是钢。“钢”炼出来了，赶快向上级报喜。上级问一天完成多少？我们说两吨。上级指示一天非完成4吨不可。以后加到7吨。好在当时上级只要数字，并不验收，浮夸风已经把人吹得醉熏熏了。这时学校

里课堂教学实际上已无形废除了。

开展教育革命，上级指示要我们学校编写理化新教材，在一无新的教学计划，二无新的教学大纲情况下，理化教师只得找出过去用过的各种课本，任意剪贴，居然在一周内完成了编写新教材的任务，放了“卫星”，并向市委献礼。

在大跃进的热潮激荡下，我确实感到党的教育方针，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教改的广阔道路。由于大家理解上的差异，行动上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无论如何势在必行。因此，我又翻阅了许多有关教学方面的资料，我从苏联中等学校课程设置上，发现有“综合技术教育”的内容，我想咱们是向苏联学习一边倒，何不从综合技术教育方面入手？这一建议果然被党总支采纳。我根据当时学校的师资、教材及可能增加的设备等条件，认为可以开设金工、木工、电镀、造纸、修理马达等科目，既可培养学生的生产能力，也可为学校增加一些经济收入。高中三年共分六个学期，从一年级开始，每学期学习一个科目，到三年级上期学完。三年级下期要应付高考，不能再增设这一课程。从我主观愿望上说，这样做，学生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，就业时便可有一技之长。

1958年秋季开学后，一年级课程增加了造纸、木工，二年级增加了金工、电镀，三年级增加了修理马达。教师为了通过劳动改造思想，也有计划地到五个车间去参加劳动。上课时这些车间里的学生、教师都非常活跃，觉得亲手操作，既可获得一定知识，也可学到一些技能，博得师生们的赞许。我觉得这一步已经迈得够大了，陈德昌校长也认为这一改革可以收到实效。可是总支书记却认为学校条件太差，极力主张与国营七一车辆厂协作，将该厂部分车间迁入学校，为教学

与生产相结合创造有利条件。陈校长虽不大同意，但当时是书记挂帅，他说了算，终于来了个厂校合并，车辆厂厂长兼学校副校长，学校党总支书记兼车辆厂书记。

七一车辆厂原是几家修理自行车铺子，在大跃进期间合并而成的，厂长及工人文化素质都比较低，他们并不是真正搞什么企业，而是只图营利，与教育事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在“左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提出了“叮叮铛，叮叮铛，课堂即工厂”的错误口号。书记让把这一口号刷写在教楼外面。从此学校院内，每天听不到学生读书声，而是叮叮铛铛的铁锤声。书记还提出要师生攻“尖端”，搞出模拟电子计算机、示波器、电动拖拉机、遥控、机器人等，几个理化骨干教师，荒废了教学业务，苦苦钻研“尖端”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最后创造出来一种自动黑板擦，算是为教学服务吧！然而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，却早已荡然无存了。

“左”的思潮也影响到课堂上，有一次语文课讲《信陵君窃符救赵》，学校党总支书记指令副教导主任查明如姬的家庭出身，分析这篇文章的毒素。副教导主任很为难，便找我研究对策。我找出了郭老（沫若）的《虎符》，指出了如姬之所以要冒生命危险，窃符救赵的理由，说明了怎样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人物的意见，才不了了之。又有一次，讲《孔雀东南飞》，还是这位书记，认为问题严重，质问语文教研组：“孔雀东南飞，飞到哪里去了？”他这一问，在语文教研组引起了很大的波动。因为解放前夕国民党南逃时，曾挟走一批教师和学生，当时有孔雀东南飞的说法。所以，他的问话虽简单，却难以回答。当他又问到我对时，我平静地反问他一句：“孔雀从西北飞来，向东南飞去，你说它飞到哪里

去了？”我说从西北飞来，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古诗里有：“白鹤东南飞，乃从西北至”。这位书记被我这一反问，弄得十分尴尬，无言以对。

“左”的思想不仅干扰着文科教学，对理科也不放过。党总支书记认为，什么力学不力学，都是脱离实际的教条。他不许物理老师讲课本，却叫讲如何打机井和小孩玩的“捻捻转儿”，说这里就有力学。他还认为教学讲“曲线”太空洞，不切实用，不如讲些像怎样做茶壶嘴等实际生活中用得着的东西。为此，我们多次进行争论。老师们也都忧心忡忡，忐忑不安，陈德昌校长也不同意上述作法，却被说成右倾。

1959年春，新学年开始，一中被定为省市双重领导的重点中学。学校根据党中央指示，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，对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。提出了劳逸结合、爱护师生的积极性，要让师生有必要的睡眠、休息和自由活动时间，以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；提出了“坐下来，钻进去，精雕细刻”的要求，很快地恢复了学校原有的规章制度；强调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；纠正了短时期出现的盲目性和片面性。市文教局派吕寿同志来校蹲点，督促检查学校贯彻执行这一纠偏工作的进行。虽然大跃进时的标语口号仍在教楼上未刷掉，但校院内已听不到叮叮咣咣的铁锤声了。

1959年8月，我被任命为郑州市一中的副校长。我意识到我还要扛起教改这一重担，继续走这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。果然不久，八届八中全会提出反右倾斗争。把1959年春纠“左”的努力斥为“倒退”，在校内开展了保卫“三面红旗”、保卫毛泽东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。把总结经验教训时，

有的同志提出的不少正确意见，说成是反对“三面红旗”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言论，受到批判。学校工作强调了“政治挂帅”、大搞群众运动、批判“知识私有”，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，干部下乡劳动锻炼，教师开始下放农村劳动。教学方面强调大闹教育革命，教学改革，放松基础知识的教学。

1958年大跃进，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。1959年10月，上级发下《高中毕业生升学成绩情况统计表》，郑州一中名列第四，在巩县二中之后，受到上级批评，压力很大。我便派骨干教师到省内外先进学校去取经。不久郑州市在巩县二中召开现场会，陈德昌校长和我去参加会议。会后陈校长问我如何向巩县二中学习，我坦率地说：“那些经验，我们学不来。”寒假，学校又搬迁到伊河路现在的校址（现在学校门开向北桐柏路），我在假期中也亲自登门向升学率高的学校和教师求教。

1960年后，全国追求升学率的浪潮逐年高涨，有些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，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，例如强迫学生留级、不准程度差的学生报考大学等。这些情况隐瞒不报，几乎成了当时公开的秘密。郑州一中书记亲拟了“学先进、争前名、超福州、赶北京”的口号。我当时提出疑问：“福州是全国升学率最高的城市，而北京名列福州之后，为什么要说超福州、赶北京呢？”书记说：“北京是在毛主席的眼皮底下，谁敢说超北京啊！”在毕业班工作方面，一中也不恰当的提出了：“全校一盘棋，支援三年级”；对毕业生则提出：“大战一百天，誓夺红状元”；校团委响应党的号召，提出：“大干一百天，实现满堂红”的口号。

我和陈校长都认为这些当时流行的做法，不能当成经验